

的问题。这个新石器时代的玉圭是我文章中非常重要的例子。这个玉圭，后来乾隆皇帝为其题字而变得意义非凡，即原来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特定意义的物品/艺术品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发生了奇妙的变化，改变了意义。我对人类学家伊戈尔·科普托夫所说的“物体的传记”很感兴趣，这意味着，事物和人类一样，也有生活史。在某些情况下，我们通过学术研究，能够确定艺术品意义变化的整个范围。我不认为时间太过久远的历史我们就无法研究，就像新石器时代，我们照样有办法。不过我也认为，人们对一个艺术品的认识在历史过程中会发生变化，这些后来人的看法会深刻影响我们的认识和判断——这一点在中国也不足为奇。这里还有个欧洲艺术的例子：现在我们知道，古希腊和古罗马大理石雕塑最初的色彩是很鲜艳的，但是如今当我们一想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，我们头脑中的第一反应还是白色的大理石（就像电影《角斗士》中，我们看到的都是白色大理石）。

皇家与文人

《新民周刊》：明代藩王，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研究题目，您之前都是研究江南文人，这次怎

“
明代中国很大，我也一直想研究明朝之外的世界，而你一旦走出江南，就会碰到藩王。”

么会开始关注皇家艺术，写这本《藩屏：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》的？

柯律格：一般的明代艺术研究很难走出两个重点：一是宫廷，二是江南文人墨客。很少有学者走出这两大研究领域。

实际上，我过去的研究集中在江南文人的艺术和社交，但明代中国很大，我也一直想研究明朝之外的世界，而你一旦走出江南，就会碰到藩王。2007年，我开始研究藩王这个项目，一开始主要是书面研究，从史料出发。但我很快就意识到，官方史书中很少有关于藩王的记载。后来2009年我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，在山西、四川、湖北、山东等地看了很多实物，许多新出土的在西方还没有发表过的东西，特别是湖北梁庄王墓出土的文物让我非常震撼。以前多是在书面看材料，现在看到那么多实物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后来大英博物馆举办的明朝梁庄王墓大展，正是那次考察的结果。

我得特别感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院文清教授。在湖北，院文清教授带我去了湖北各地，不仅给我看了我想要看到的实物，还推荐给我许多我不知道的东西，令我受益匪浅。他是楚文化的专家，负责藩王墓的发掘。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曾写过一篇研究明朝金器餐具的

文章，但用的都是书面资料。那一次考察，我见到了这么多金器实物，是前所未有的，我非常兴奋。这坚定了我写这本书的信念。

当然，我并不是研究明代藩王的学者。从2000年开始，已经有不少人开始研究明朝藩王，特别是中国四川、山西、湖北等地的学者，他们研究了藩王与书法、藩王与出版等学术问题，我是受到他们的启发进行的研究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藩王和宫廷既相似，又不同，您觉得藩王的艺术和宫廷艺术有何异同之处？

柯律格：藩王没有实权，他们不能拥有军事武装，所以他们有更多精力去关注文化，使得艺术在他们的庇护下得到更好的发展。比如朱元璋当上皇帝后，从宋到元的宫廷收藏就到了他的手上，他将部分藏品拿出来送给了每个儿子。前人对于明代皇室诸王看法，基本上认为他们在永乐朝以后，在政治、军事领域的的话语权有限，成为了国家某种程度上的“寄食者”。我不这样看，我认为纵然在某些领域诸王的权力受到了限制，但他们在学术交流和文化生产方面助力甚多，而在国家礼仪仪式中则具备着重要的象征意义。

当然，藩王和皇帝兄弟的关系往往很紧张，皇帝对他们总是很提防，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难以施展拳脚，但这更使得他们有